

清华人文修养丛书

杨 民 著

万川一月

中国古代散文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人文修养丛书

万 川 一 月

——中国古代散文史

杨 民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述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上始先秦,下迄明清,条分缕析,总结了各具时代特色的散文成就;同时,对一些传世佳作进行具体入微的评析,点线结合,构建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整体图像。

本书适合选做文化素质教育的读本,也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参考。

书 名: 万川一月——中国古代散文史

作 者: 杨 民 著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54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4405-8/I·34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18.00 元

《清华人文修养丛书》

编写前言

每一位聪明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把自己拘囿在某种专门技术的狭小圈子里。于是,向未来世纪的栋梁提供足以启迪智慧、增进学养的读物,就成了当代学者的历史责任。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凡有当代价值的文化遗产,都应是有生命活力和魅力的,但一写成书,多彩的生命有时不免会失去光泽,这很令作者与读者苦恼。

清华大学承担着培养跨世纪一流人才的历史使命。承袭老清华“古今会通,中西会通”的优良传统,我们从80年代初就开始为理工科学生达到“文理会通”创造某些条件。“三会通”是人才培养的至高境界,只有极少数不畏艰险、才智超群的人才可臻至。但每一个有为的青年都应具备广博的学养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本丛书就是十几年来,清华大学邀集海内外学者为本校学生开设讲座及人文选修课的成果。在全校120多门选修课及浩如烟海的讲座中,只有少数久经考验、被广大学生视为精品者,才有幸入选。

本丛书编辑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

顾问:张岂之、何兆武

主任:胡显章

副主任:吴敏生、徐葆耕(常务)

委员(姓氏笔划为序):杨君游、侯竹筠、胡苏薇、袁德宁、

蔡鸿程

第一章 百家争鸣中的色彩纷呈

——先秦散文

第一节 散文的源起

我们对于自己的童年时代，记忆都十分稀微、模糊。即使记得一些事情，也有赖我们父母的不断提示，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而得以固定。自己觉得真实不二，其实已发生了许多的变形和扭曲，和原本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人类历史的童年也同样如此，所经所历，大多数都已湮灭、忘却，即使残留下来几许，也总是斑驳一片，难以连成系统，同时也有许多后人增加的东西。如今我们根据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文献材料，只能大体了解早期社会的概貌，甚至这种概貌往往也极难断定。要想了解得更加确定，更加具体而微，我们就只有等待考古学家的不断发现，将历史文献和发掘的实物作相互的参证，才能够真正做到。

卜辞和卦爻辞

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早的散文是甲骨卜辞。因为它们是在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殷商国王用来占卜的文辞，所以称之为甲骨卜辞，其文字即称甲骨文。

甲骨卜辞的发现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学乃至艺术的研究和认识影响巨大，其价值简直无法估量。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为生病吃药，在北京偶然发现了刻着图文的甲骨，开始留意购买收集；随后刘鹗和罗振玉等

人也大量地收购,并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近百年来,经过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以及胡厚宣等学者的整理、研究,结合先后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铭,使得对殷商的历史研究进入了实证阶段,对商朝乃至周朝社会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甲骨卜辞零碎残缺,文字也怪异难辨,但是既然有大量的龟甲文字出土(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掘地三尺,尽数搜寻,出土有10万片之多),只要加以整理归类,渐渐认识了文字的意思,就能大体看出远古时代的社会面貌,比如国家的形成、宗教观念、农业、手工业以及祭祀和战争等的情况。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卜辞都过于简短,往往是片言只语,达到一百余字的已是很少很少: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第375片)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卜辞通纂》第363片)

很简单,但是很完整。前者带了一点诗的情调,像歌唱吟咏似的;后者神秘秘,似乎是对未知的揣测和畏惧。读起来又令我们感到,当时特别注意天气的情况,那该是农业社会了。

像这样的文字其实也不多,大部分的卜辞难以辨认,即使我们知道其中表现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事情,能准确地讲述清楚也不容易。今天我们只能将它们视作文学的雏形,知道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中国文字与文学样式,后来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就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

由甲骨卜辞发展下来,相去不远而意思更为清晰、内容更为复杂的,则是《周易》中的卦爻辞。

《周易》是周朝的占卜书，在此之前，尚有《连山》和《归藏》。汉代的郑玄在《周易正义八论》中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无所不备。”这也仅仅是一种解释，因为对于夏商时代的占卜书，《连山》已了不可见，《归藏》也只是在后人的辑佚书中能够看到一二。惟有《周易》，一直到今天还仍然保存未失。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去谈论《周易》，至于《连山》和《归藏》，就只好付诸阙疑了。

《周易》通常称之为《易经》。它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就经来说，它由爻、卦和爻辞、卦辞两个部分组成。爻分阳爻（一）和阴爻（--），六个爻构成一卦，这样参差或者重叠使用，共可组成八个卦，即八卦，名称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象征自然界中的八种现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它们编排组合，共形成六十四卦。卦辞是六十四卦中每卦要义的文辞，比如《复》卦形下面写道：“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这里“复”是卦名，其他就是卦辞。爻辞是六十四卦中说明各爻要义的文辞。每一爻均有爻题和爻辞。爻题一般是两个字，表示阳爻的用“九”，表示阴爻的用“六”，另外一个字表示爻的次序，分别是“初、二、三、四、五、上”。比如上引《复》卦中有一爻辞云：“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这里的“上六”是爻题，其他就是爻辞。八卦中的各爻位置不同，相互的关系不一样，刚柔相应、相敌或者相胜，产生了适当或不适当的结果。人们在卜筮中占得各个不同的卦象，分别有各种不同的卦爻辞，占卜者对这些文字加以解释说明，以此去预测未来行为的吉凶祸福，以便事先决定是否实行或作调整。

在古代，这些卦爻辞起到了“决吉凶，问休咎”的作用，内容从婚丧嫁娶饮食起居到征战出行，十分广泛。就文字来看，一般都十

分简单,很难形成完整的文章。但是通篇读起来,如果将有些内容联系在一起,也可以看出一种较为完整的意思。比如一般文学史中常常引用的几段: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九四”)

我们仔细阅读,会发现这几段文字有一定的联系性,它们描写的是早期社会中的抢婚场面,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的一些民风民俗,烧、杀、抢、掠频繁地发生。“突如其来”,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成语,原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又比如“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艮》卦辞)和“困于石,据于蒺藜;入其宫,不见其妻”(《困》“六三”)这两句,我们可以断定,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章中的句子,作卦爻辞的人,将它们选用来,分别置放其中。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

履霜,坚冰至。(《坤》“初六”)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

这几句爻辞,几乎全成了后人常用的成语和格言。社会总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循环往复,没有一平到底的,也没有一去不复返的。这大概是由对大自然的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认识和总结,转过来又去归纳总结社会发展的规律。行于霜上就知道严寒冰冻即将到来,这又在告诫人们要及早提高警惕了。第三句说得更好。君子总是精进奋发,自强不息,时刻不放松懈怠。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即使有什么危险,也不会有过失的。这些都是对自然和人生长期观察和经验的总结,几千年来,这样的思想一直都影响

着我们的立身行事。

《周易》中还有一些描写战争和生活场景的，比如《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画面凸现，动态十足，只可惜都是短小的篇什，我们只有用想象力去填补其中留下的空白了。

对《易经》中这些卦爻辞的解释阐发，主要有《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和《杂卦》，共七种十篇，历史上称之为《易传》。《易传》是把一种较为客观的卦象用主观的阐释来生发，大的方面，是希望国家的治理能够步入一条正道，上下安宁和平；小的方面，对具体的每一个人，则是激励其努力，抚慰其痛苦，给予其希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易传》对人生是采取积极态度的。传是后人对经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内容、风格和文体都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孔子所作，这难以令人信服；一般认为出自于儒家学者之手。产生的年代是在战国时期，所以经和传二者相隔的时间已经很远，这里我们不去详细地讨论。

神话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故事，中国也不例外。我们今天保存下来的上古神话，主要是靠《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穆天子传》以及《庄子》等书的收录。这些神话故事，经过人们世代代的口头传说，洗涤了冗繁琐碎，保留下清晰的人物性格和感人的故事情节，作为散文来阅读，很值得我们注意。

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诩。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山海经·北山经》）

这是说一位公主，遇难于海，死去仍要化为小鸟与水患斗争，一斗到底，不屈不挠。力量的悬殊是明显的，但是她却矢志不移，追求成功不已，令人有行微志大的感觉。短短一小段文字，叙述故事，却又是对某件事实的解释。精卫鸟“文首，白喙，赤足”，“衔西山之木石”来填塞东海，写得可怜可敬，美丽而悲壮。这大概是上古时代大水神话系统中的故事。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狴、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狴，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这应该是上古时代大火的神话。羿不但能百步穿杨，而且能上射十日，下除百怪。但是这也得感谢尧的拔擢贤才，用人得当。羿无疑是一位大英雄，难怪后来河伯化作白龙，独自在外边游荡，被羿误伤一目，告到天帝那儿，天帝也不受理此事。但屈原在《天问》中说“胡为射乎河伯而妻彼洛嫫？”大概是认为大英雄抢他人的妻子也同样不尽妥当吧。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晌，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汉书·武帝本纪》颜师古注）

此段文字很有意思。大禹开山，要化为熊来发力，又怕妻子看到自己的熊样子，偏又误把鼓碰得山响，使妻子提前而来。果然妻子不快，落荒而逃。妻子跑了，大禹仍然舍不得自己的儿子。历史上我

们把大禹看成圣人,这里却把大禹说成是一个普通人,除了神话的地方稍怪以外,其他都是把大禹当作常人而使人感到更为可爱。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并且把这个世界描绘得十分具体。宙斯掌管着雷电云雨;雅典娜是智慧女神,是宙斯不想要却生下的女儿;普罗米修斯是提坦巨人伊阿珀托斯的孩子,从天空窃火种给人类,但是却受到了宙斯的严厉惩罚;等等,其中有许多神,相互之间也有许多的故事。但是历史归于历史,神话归于神话,历史和神话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历史和神话常常混为一谈,历史人物是神话人物,神话人物也是历史人物。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禹,大禹之子启则建立了夏朝。《史记》中说殷商的始祖契,母亲简狄原是帝喾的次妃。简狄有一天跑去洗浴,见到一只黑色的鸟落下蛋来,于是就吞了下去,因此有孕而生下了契。这可能都是把神话历史化,或者把历史神话化的缘故。

无论如何,神话的创作基础是现实的,它们或多或少都显现了上古社会的历史事实。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材料散失,我们难以系统地认识它们,但是,正因为是凤毛麟角,才值得我们珍视。

《尚书》

《尚书》是五经之一,称尚书,也就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尚书》记载了从上古到西周政府机构所发布的重要文稿、誓词和诰词等。古代一般认为此书经过了孔子的整理。“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隋书·经籍志》)。现在我们都把它看作中国古代第一部记叙和论说文集。

秦代焚书坑儒,《尚书》已不复存在。汉文帝时,有一位老人叫伏生,还能记得《尚书》的内容。朝廷便派人去他那儿,凭他口授,记录下来《尚书》的篇目内容,共 28 篇。后来又从别处得到《泰誓》

一篇，一共就有了 29 篇。汉武帝时，又有人拆旧房扩大居所，在孔子的故居发现了一套《尚书》，比原来的《尚书》多出 16 篇。为区别起见，伏生口授的《尚书》因为是用当时的汉隶所写，所以称作《今文尚书》，而孔子家宅的一套《尚书》用的是篆书所写，相对而言，就称作《古文尚书》。到了晋代，又出现了另一套《尚书》，流传了一千多年，直到清代。清代，经过考据家阎若璩的考证，辨伪识真，溯源逐流，知道这是晋人做了手脚，从而在学术界得到了共识，从而有了《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之分。现在的《尚书》共有 58 篇，除 33 篇为今古文《尚书》所有，其余皆不可信。

《尚书》共有《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个部分。其中的《虞书》是记述尧舜禹等人的事迹，后面的三部分则分别记述了夏商周三代的事迹。《尚书》的文章年代久远，又是用当时的口头语言所写，所以后人不易阅读理解。唐代的韩愈一贯爱写不易理解难以上口的文章，即使如此，他也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①，由此可见《尚书》的难读程度。我们今天不必硬性地去看它们，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是古代早期的散文，这些散文中所显现的风格和突出的优点，许多都被后世继承，我们后世的散文，也就是在这一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尚书》里面也有几篇文章，我们应该记住，至少应该知道它们的篇名和内容。

《禹贡》是《夏书》中的一篇。“贡”是贡献朝廷的意思。把土地上的奇珍异宝，谷物产品，罗列一通，自下献上。书中将当时的中国划分成九州，详细记述了山川田地，物产贡赋等方面的情况，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地理资料。后来的《汉书·地理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写作上也多以此书为依据。陈柱在《中国散文史》中说它“文字于极参差不齐之中，寓有极整齐排偶之笔”^②，是对此书写作艺术的极好总结。作文在平衡中寻求不平衡，在不平衡中寻求平衡，也是一种散乱中的统一，我们的先祖在开始行文的阶段就已经知道这样去结构和叙述了。

《盘庚》是《商书》中的一篇，其中又可分为上中下三篇。今天我们见到的选本，都只选上篇。上篇，其实是第二篇，是盘庚在迁徙中途发布文告的记录。另外两篇，一记录迁徙之前，一记录迁徙之后。迁徙之前的一篇，因为老百姓尚不知迁徙的利害、艰难，盘庚凭借自己的威望和权力，短短的一篇演说，“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几句话，并没有讲出多少道理，老百姓就可以信服顺从，跟着盘庚走，毫无怨言。迁徙后的一篇，说到社会得以安定，老百姓从迁徙中尝到了甜头，“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史记·殷本纪》），所以话也好说，不必去注重如何遣词作论，自然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惟有迁徙中间的一篇，老百姓终日居无定所，似乎总是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希望，埋怨和牢骚也就开始产生（《史记·殷本纪》）。这时候要继续迁徙，要使得民心安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去劝说百姓，真正讲出道理，令人信服，这样的文章是最难写的。盘庚的演说要想收到成效，演说家当然必须使出浑身的解数，好文章往往是在这个时候产生。艰难困苦，玉汝以成，作文也是这样的。

这是一篇优美动人的文告。盘庚在这篇文告的开始就点明了主要论点：“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郑重地提出上天作为警告，以保民续业为使命。但是他又更为具体地去说明迁徙的必要性，每一位官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且提出奖善惩恶的原则，这在当时众心不稳的情况下，都是十分必要的。此篇虽是文告，却很朴实。盘庚一口一个我字，把内心的话实实在在地倒出来，与听众连得紧密。在叙述中，盘庚使用了许多比喻，“若颠木之有由蘖”，“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迳，其犹可扑灭”。这种取譬设喻，听众当然容易去理解，从而也容易接受盘庚的迁徙理论了。

其他尚有几篇，比如《周书·无逸》，是周公告诫年幼的周成王，希望他不要贪图安逸，不能荒淫乱国，必须勤于政事，治理国

家；又比如《周书·秦誓》，是说秦穆公后悔不听蹇叔的话，劳师袭远，被晋国打败，于是痛定思痛，分析缘由，批评自我而作此悔过之辞。这些文章，我们不必过多地阅读，但我们应该知道它们，记住它们，因为这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所在，以后的文学就是从这儿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特点是简古、朴素。在《论语》中，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说“礼后乎？”孔子对子夏大为赞扬。这是因为子夏从老师的谈话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绘画的时候，是先有了白色的底子，然后才好画，由此而推论之，那是先有了仁义然后才能产生礼乐。你瞧，也仅仅是简单的两句话，里面却已经包含了非常深奥的道理。中国早期的散文简古、素朴，这也是文学写作的基础，正因为有这一牢固而坚实的基础，才有了后来色彩斑斓的散文兴盛时代。

第二节 历史散文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儒家的创始人。在春秋时代，经过孔子删削编订的著作，主要有《诗经》、《尚书》、《礼记》和《乐记》等。孔子述而不作，并没有自己写什么东西，真正动手写下的，相传只有《春秋》一部，并且是根据鲁国的史料来完成的。至于《论语》，那还是孔子的学生根据他的言谈行事所记录下来的。关于《论语》，我们稍后将在“诸子散文”一节中再去详细地论说。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以春秋时代的鲁国为着眼点，以鲁国的12个君主为经线，贯穿始终，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时间里，在中国各诸侯王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所出现的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春秋》的内容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措辞也非常谨慎，是有话

则写，每写必短。我们试看其中的一段文字：

（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月，雨。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穀。冬，公子友如齐莅盟。楚人伐郑。

一年四季，好像记录的都是琐碎的事情，但是细细品味又未必尽然。天不雨，记录在册，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雨水关乎民生，应该很重要，不过因为没有形成灾情，所以不言旱。徐国打败了舒国，因为战胜了舒人，同时又没有使用许多军队，所以说“取”（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所含有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也很耐人寻味。又比如“（隐公四年）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州吁杀了卫国的国君，自立为君主，这是三月的事情，但是到了九月，州吁又被卫国人杀死。孔子在记录这件史实时，先是用“弑”，以表明是称臣者杀君，是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所以用“弑”字表示。而卫人杀死州吁，则是正义的行动，所以是应该的，所以使用“杀”字，虽然州吁在经过政变以后已经成为国王。“弑”与“杀”，些微的差别，却具有评判的作用。我们设想，假如州吁自立为君主，能维持统治几十年，到那个时候再发生某些事件，不知历史将要如何记录。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春秋》的文字无不简短，叙事多简洁，选词用字都含有褒贬的意味。后人常常将这一点称之为“春秋笔法”。

读《春秋》，一般总觉得干巴巴的，令人乏味。《宋史·王安石传》中说王安石对《春秋》不敬：“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王安石说的是有道理的。一部史书，零零碎碎，构不成什么情节，又怎么不像是“断烂朝报”？但是此书文字雅洁，语言含蓄，往往有某种弦外之音，概括

说是词约而意丰。这种在文学的写作上对词约而意丰的追求，把它视作上乘的杰构佳作的标准，对我们后来的散文写作影响是非常大的。《春秋》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因为《春秋》，才有了后来为阐释其微言大义，详述其中历史事件的《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这三部后人称为《春秋三传》的著作，从而开启了我们后来典籍丰富的历史散文的兴盛局面，所以《春秋》在历史上和文学史上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

《左传》

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下某一历史事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设想我们去叙述一件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如果我们是现场的目击者，是置身其中的人，一旦秉笔记录，我们就很难按捺住自己的情感，很难不用颤抖的笔去叙说；如果经历岁月的洗礼，风雨经年，我们又不易注入激情，不易用撩拨人心的笔去记叙历史。得其环中，超出象外，诚非易事。但是，一个叙述者如果有过人的识见，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即使是当时当地的历史事件，在他的眼中也只不过是历史的一瞬。他也许会激动，会情不自禁，但是他更知道，这激动是个人的感情，作为历史学家，是要不得的。如果摆脱了这一感情，他就能冷静地观察、分析、构思、写作，从而展现出一段人类历史的底蕴。如果是早已消逝的历史，他又能发见这些历史的意义所在，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历史中看到现实。冷静是他的笔，情感则是对读者心灵的撞击。

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其作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作者对他所描画的对象，始终潜存着一缕情感，对早已流逝的历史往事，他能体贴入微，叙述明晰，仿佛全都是他所经历的，但是他又能够高高地站在历史的峰巅，俯瞰透视，带着睿智的目光，对历史作出客观冷静的评判。

《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在《史记》和《汉书》

中,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作者是左丘明。但是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时代人,《左传》的内容和文字,经过后人的研究考证以后,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并不是春秋时代的人所能够完成的。但是作者究竟是谁,一直到今天学术界也莫衷一是。这样,《左传》的作者就成了一个千古的谜团。在没有得到更新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取证之前,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产生于战国初期,其作者是一位文采浓郁的史学家,他的具体姓名已经失考。

《春秋》记述了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左传》则详述了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4年的历史,比《春秋》多写了27年的历史。不过《左传》却又是以《春秋》为大纲,然后详细地叙述了在二百多年中,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这包括政治、外交、战争、人事、社会状况以及鬼神占卜等。

在这些历史的写作中,作者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一个思想,这就是敬天畏民。“敬天”是一个空泛的词。什么是天?一个君主应该如何敬天?敬天有什么好处?不敬天又有什么坏处?这都难以回答,但是《左传》在说到敬天时,总是要落到实地,落到现实社会的民众中来。桓公六年,随侯要派兵攻打楚国的军队,他在权衡敌我双方的力量时,认为自己牲祭所用的牛色纯体壮,黍稷也丰盛齐备,足以取信于神,所以能够战胜楚国军队。但是随国的一位贤者季梁告诉随侯,所谓道,那是要对民有忠心,对神有诚意。对民忠,则是要去考虑做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民恰恰就是神之主。季梁说:“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结果随侯听从了季梁的劝告,悉心修政,而楚国也不敢轻易发动战事。庄公十年,发生了齐鲁长勺之战。战前,庄公以为自己祭祀拜神的时候,总是依礼而行,必诚必信,曹刿也说是“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惟有取信于民、致力于民,才能够取得胜利,使国家长治久安。“畏民”,则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遵循世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美德立身行事,希望人能谨言慎行,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去做,所谓“君义,臣信,父慈,子孝,兄